

反义并列结构的成词条件及初步解释^①

张金竹^②

[摘要] 反义复合词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词汇类型,有其生成的原因和条件。本文从语法、语义和语音三个方面探讨了反义并列结构的成词条件。汉语反义并列结构的弱标记性、强象似性和连接词的低频使用性,以及汉民族文化的影响都有力地推动了反义并列结构的出现,并向词汇化方向发展。反义复合词是汉民族文化在词汇层面的独特表征,具有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反义并列结构;构词;标记性;象似性

Word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Antisense Coordinated Structure and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School of Hany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Zhang Jinzhu

[Abstract] As a special kind of Chinese vocabulary type, antisense compound has its formation reasons and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mmar, semantics and phonetic, we discuss the word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antisense coordinated structure. Weak markedness of antisense coordinated structure, strong iconicity, low-frequency use of conjunction in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that promote the appearance of antisense coordinated structure and push them into lexicalization. Antisense compound is a uniqu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lexical level, which has the typology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antisense coordinated structure; word formation; markedness; iconicity

一、引言

关于词汇的来源,西方语言的研究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 Chomsky 和 Lapointe 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词法,词属于词法范畴,先于句法;另一种以 Sproat 和 Bake 为代表,认为词汇产生于句法,强调词法层不单独存在,也不存在构词规律,词法在本质上就是句法,

①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计算机模拟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740063)资助。

② 作者简介:张金竹,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语言习得。

受句法原则与参数的限约(黄月圆,1995)。中国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后,理论和方法都受到印欧语理论的影响,形成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眼光”。汉语研究者虽也承认句法和词法的区别。马真(1981)、程湘清(1992)、解惠全(1997)、王宁(1997)相继提出汉语复音词,有句法构词和非句法构词两个来源。不可否认,汉语的双音词很多是由短语凝固而来的。但“很多”不是“全部”,除了短语的词汇化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如跨层结构中相邻成分的固化等。

并列式双音词两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有同义(近义)、类义和反义三种。据张博(1999)统计,在先秦时期,同义并列占并列式总词数的 53.71%,类义并列占 37.05%,反义并列占 9.24%。虽然同义并列在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作为并列式复合词中特殊的一类——反义并列复合词,由于其自身内部包含的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成分,造成了它在词汇和语法上的特殊地位。本文从《现代汉语词典》(2005 年第 5 版)中选取 240 个反义复合词(见附录一)为例(这里暂不讨论词和短语的区分),从句法、语义和语音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反义并列结构的成词条件。

二、反义并列结构的成词条件

任何事物和现象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反义并列结构的成词也不例外。

(一) 反义并列结构的语法限制

1. 句法位置

上文提到,反义并列双音词来源于句法,即由并列或联合短语凝固而来。那么前提是各并列肢能够进入并列这个句法结构。句法位置对并列短语的出现是有限制的。不管是词性相同的并列还是词性不同的并列,连用后都保持词性不变,并列各项的句法环境相同,处于同一语法层次,充当同一语法成分。从这一点上看,并列结构是结构语言学意义上的向心结构。从现代汉语的语料(均来自北大 CCL 语料库)来看,并列结构均可在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位置上出现。我们先看下面的句子:

- (1) 天和地并不相交,天地之间相距 8 万里。——主语
- (2) 并据其预测价格走势,在认为合适的价位上买进和卖出。——谓语
- (3) 这穷人就最怕丧事和喜事儿。——宾语
- (4) 我们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又是矛和盾的关系。——定语
- (5) 城市很安宁,远处近处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状语
- (6) 中国变得既古老又现代,从而更加丰富了。——补语

一般情况下,并列短语的句法功能与单个并列项的句法功能相一致,这也成为并列项连用的基本条件。删除其中的一个,从结构上看句子依然成立。事实上,并列结构在各句法位置上的出现是不自由的。例如:

- (7) a 他赚了很多钱,又赔了很多钱。
- * b 他赚和(、)赔了很多钱。——谓语
- c 赚和(、)赔在生意场上是很正常的事儿。——主语

从(7)中我们可以看出,动词用连词“和”或停顿在谓语位置受限制,而在其他句法位置则比较自由。谓语位置和非谓语位置的并列功能与词类之间并列功能的差异是对应的。动词的优势功能是作谓语,而在非谓语位置上,动词由动作过程转向实体指称,其功能趋同名词。(7c)中的“赚和(、)赔”已不表示具体的动作,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此可以出现在主语的位置。此外,在定语位置上,动词也可以自由地用“和”“与”“跟”或停顿等手段并列在一起,如“生和死的考验”“胜与败的立场”等。

主语和宾语同属非谓语位置,句法描写中常归为同类句法功能。但实际上二者对并列结构的限制是不同的。本文调查了《骆驼祥子》中反义并列短语在句法位置上的出现情况,其结果如下:

表1 反义并列结构在各语法位置中出现的比例

句法位置	主语	宾语	定语	谓语	状语	补语
比例	23.73%	33.9%	13.56%	16.94%	10.17%	1.7%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各种句法位置都能接受反义并列结构,但在宾语位置出现的比例最高,也就是说宾语比主语更能接受反义并列现象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谓语位置出现的比例远远低于在主、宾语出现的比例。刘丹青(2008)通过对宁波话以及《京语回话》和《黄金时代》中用“跟”“和”连接的并列短语的调查,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认为:主语远比宾语更易接受并列结构。究其原因,一是可能调查的对象和语料来源不同。另外,反义并列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相对抽象的概念,与汉语的主语位置更强调其有定性相矛盾,因此更倾向于出现在宾语位置。反义复合词在成词之初,往往以形式距离较长的结构出现在句子中,也习惯于放在句子之后。

根据上表的统计,我们可以将反义并列结构在句法位置中出现的可能性表示为如下序列:宾语>主语>谓语>定语>状语>补语。句法位置是反义并列结构得以成词的外部条件。某一语法位置对并列结构的限制越宽松,那么其出现的频率就越高,其成词的可能性就越大。

2. 反义并列结构的词类制约

总体上看,反义并列结构不管是词还是短语,对词类的选择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虚词和实词。虚化程度越高,越难以并列。这跟同义并列双音词不同,同义并列双音词是在汉语词汇双音化的驱动和同义并列构词法的类推作用下,运用同义联想,通过词法途径把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词并联在一起构成的,如“必定”“刚才”“互相”“依据”“按照”等同义并列介词。不存在句法演变的过程。而反义复合词中的“反正”“早晚”“死活”“迟早”“好歹”等都是在实语素的基础上并列成词之后,引申出的虚化义(袁嘉,2009;丁喜霞,2006)。

而英语中的虚词(前置词)有些则可以并列,如:

(8) There are lots of tourists in and outside the exhibition building.

(在)展览馆的里面和外面(里外)都是人。

(9) He walked up and down the locker room.

他在衣帽间里来来回回地走。

英语和汉语中的虚词基本上都是由实词或较实义的词演变而来的。但不同语言、词类

以及范畴之间的语法化程度有别。从例8和例9可以看出,英语中的虚词,相比较于汉语中的对应词却带有较强的实词义。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英语中的虚词其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而汉语中的虚词甚至实词内部较虚的词项其语法化程度比较高,因此不能进入反义并列结构。

除此之外,反义并列结构的连接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印欧语的泛用并列连词通常适合于名动形各个词类和各种短语、小句,如英语的“and”“or”,德语的“und”,法语的“et”,俄语的“и[и]”(刘丹青,2008)。而汉语中却缺乏类似的泛用并列连词。汉语中的连接词“并”实为轻递进连词。而“和”的连用更容易受到语义的限制。“与”则带有很强的书面色彩。反义并列结构的功能就是使形式简洁,语义周遍。汉语中的虚词语法化程度较高,意义更加虚化,再加上缺乏泛用的并列连词,因此在词类范畴上,汉语受到更多的限制,而英语则相对自由。

参与反义并列结构的主要是汉语最基本的三类词: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但在这三类词中,其反义并列功能也存在差异。在240个反义复合词中,参构语素和整词的语法属性如下表:

表2 反义复合词与参构语素的语法属性

词性 语素属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副词		合计
	例词	个数	例词	个数	例词	个数	例词	个数	例词	个数	
名+名	利害	92	矛盾	3	规矩	3			朝夕	8	93
动+动	出入	24	操纵	68	生死	1			死活	2	90
形+形	粗细	47	寒暄	3	纵横	2	多少	1	多少	8	53
形+名	高下	1									1
形+动			明灭	1							1
动+形	动静	1									1
代+代							彼此	1			1
合计		165		75		6		2		18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参构语素中39%为名词性语素,37.3%为动词性语素,22%为形容词性语素。虽然名词性语素和动词性语素在数量上相当,但实际上二者的并列功能也存在差异。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宾语、主语位置相对于谓语位置而言,更适宜并列结构的出现。而动词的语法功能是作谓语,因此汉语名词作为论元的并列远比动词作为谓语核心的并列自由。在非谓语位置,名词既可以直接组合,也可以加并列连词。

(10) 创造和信仰不一定统一,正如表(和)里不一定统一一样。

而在谓语位置,汉语动词的并列则很受限制。谓语位置相对自由的是构成作为并列类的连动句或复句层面的联合复句(不是严格的并列),而单音动词的组合仍较受限制,因为连动句更常见的是动词短语的组合。

(11)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韩非子·外储说》)

(12) 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鬼谷子·揣篇》)

(13) 他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

当然,单音动词直接并列的例子也很多,如:

(14) 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丰》)

如果说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的概念成分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动词在谓语位置的并列,其距离远远大于名词的并列,也就是说,名词表达的概念其语义距离更近,更自由,而动词所表达的概念其语义距离更远,更受限制。Haiman(1983)将其表述为距离动因。Givón(1990)称之为“相邻原则”(the proximity principle),定义为“在功能上、概念上或认知上更接近的实体在语码的层面也放得更近”。简单地说,即单元之间的表层形式越紧密,其意义联系往往也越紧密,因而形式距离是意义距离的临摹。

根据并列结构的词汇属性和并列肢之间融合度的强弱,我们把反义并列结构分成组合式结构、黏合式结构和整合式结构三类,并且认为典型的反义复合词是整合式结构,短语是组合式结构,介于二者之间的是黏合式结构。这里我们需要结合词的本质属性,即词的意义、结构、语音以及使用频率这四条标准(具体分析),对词和短语进行划分:典型的词,成分间的整合性最强,结构凝固,使用频率高。而短语成分间的融合性最弱,只有组合关系,除了音节数可以和词相同以外,一般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标准。而“出入”“成败”“夫妇”等词,组合体的意义不仅可以从其并列肢的意义加合得出,还可以加上并列连词,如“和”“与”等,但形式上一般不加,且已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当中,不是典型意义的反义并列复合词,这些词尚处于词汇化的过程中,可以视为“类短语词”^①。因而,我们将短语、类短语词和典型的词的距离表示为如下序列:短语≥类短语词>典型的词。

表3 各类参构语素在类短语词和典型的词中的比例

	类短语词		典型的词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名+名	50	53.8%	43	46.2%
动+动	79	87.8%	11	12.2%
形+形	10	18.9%	43	81.1%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形语素在典型的词中,所占比例最高,并列肢之间的融合度最强,名语素次之,动语素最弱,仅有12.2%,绝大部分动语素组合成的反义并列结构,处在词汇化的过程中,或带有词汇化倾向。动词并列结构在句法层面的形式距离与在词汇层面上是一致的,其距离大于名词的并列,更大于形容词的并列。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的概念成分之间的距离,动词性反义并列结构即使并列成词,其词汇化的程度也很低,很难达到典型的词的整合程度。当然,这跟其出现的句法位置也有关。因此,三大类单音节实词的并列功能可表示为:形容词>名词>动词。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演变的动态性,类短语词处在词汇化的不同阶段,有的可能处于初级阶段,是各并列肢的组合同义,有的词汇化程度高些,在使用过程中偏向于语义的整合义。如“兄弟”,表示“哥哥和弟弟”时,是组合同义;泛指比自己年纪小的人时,是整合义。

(二) 反义并列结构的音限制

就动词而言,单音动词的直接并列更容易成词。根据冯胜利(2009),“汉语的标准韵律词一般均取双音节形式。由于汉语的合成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所以汉语的合成词必取韵律词的音步形式”。韵律词是一种韵律和词法句法界面的现象(2000)。韵律词虽然与词汇词、句法词不是处处吻合,但它之所以被称为“词”,就是因为它对应的基本上是汉语中的词(主要是合成词)。单音动词的并列有强烈的词汇化倾向。结合韵律词理论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严式韵律词的构成过程,因此既有韵律的严格限制,排斥超过两个单音动词的并列,也有构词的(远比短语构成严格)要求。说它是“严式韵律词”,是因为它比一般的韵律词更受限制。按照冯胜利(2000,2009)的观点,三音节单位也能构成由“超音步”充当的“超韵律词”,包括词法词如“总统府”和句法词如“小雨伞”。而单音动词并列强烈排斥这种“超韵律词”,基本上只允许单单成双的形式。另一方面,韵律词允许相当多的自由临时组合,如“小树、小鱼、大马”等,而单音动词的直接并列如前所述,基本上只允许很凝固的组合,很多意义上合法的并列都受到排斥。

那么,为什么单音节动词的并列比双音节动词更能成词呢?这是因为动词的典型词长是单音节和双音节,双音词加入并列结构,必定组成短语级单位,而且“大于三音节的组合,譬如四音节形式,必然是两个音步(因此是两个标准韵律词)的组合”(冯胜利,2000:78)。双音节动词的并列在韵律上很难充当构词单位,因此其反义并列结构更倾向于短语的组合,而不是词汇结构。句法上单、双音动词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而事实却是单音动词因韵律原因而受到句法规则的“青睐”,更容易并列成词。

不过双音动词的直接并列也只是相对自由,它仍受到韵律的制约。理论上,双音词并列可以有两个词、三个词到N个词参与,也允许字数不同的动词间的并列,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都限于两个双音词构成的四字格,如“吐故纳新”“优胜劣败”“破私立公”等。这一种格式压倒所有其他可能格式的总和,而双音词与单音词的直接并列几乎不可能。这些显示非“V双+V双”四字格的双音动词并列仍受到音节数这种韵律因素的强烈制约和限制。

再简要看一下形容词。对直接并列的限制也主要见于单音形容词,两个单音形容词在定语位置很难并列。汉语确有“矮胖(的)男人”这样的例子,可是它无法类推。双音形容词的并列要自由一些,但仍受一定字数的制约,仅限于两个双音词构成的四字格。

(三) 反义并列结构的语义限制

反义并列结构要求并列肢之间在语义上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均衡性,即所表示的语义概念属于同一语义范畴或者具有相同的上位范畴,这是反义并列的内部基础。从我们对240个反义复合词的统计来看,除了“高下”“动静”“明灭”这三个词,其并列肢存在异类(语类)现象之外,其他237个词的并列肢都是某一上位范畴统摄下的相同层次范畴的内部成员,如“国家”“规矩”“方圆”等。

前文已经提到,动词相对于名词、形容词而言,在进入反义并列结构时受到更多限制,这要归因于动词的语义属性。动词一般表示动作和过程,在进入反义并列结构时,为取得自由的句法位置,其语义功能需要发生变化。同样,形容词表示修饰和属性,名词表示实体和命名,这些相互区别的语义功能也会发生转化。Halliday(1992)认为,语义不是僵化的成品,而

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转引自朱永生、严世清,2000)。从总体上看,反义并列结构成词导致的转义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向:

A. 过程→实体。反义并列动词性结构本身不再表示具体的动作,而是动作本身所具有的实体特征。

(15) 成(和)败在此一举。

(16) 他早已把生(和)死置之度外。

这都是动词向名词而非形容词语义功能的转化。因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名词也用“和/与”,而形容词多用“又”。“又”是副词,能标记并强化并列项的谓词性。“和”与“又”作为并列标记的差别,朱德熙(1982)已经注意到。

B. 属性→实体。

(17) 这件衣服大小正合适。

(18) 你做事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啊!

以上两例中,形容词表示抽象的概念实体,语义功能向名词靠拢,成词之后这种语义更加突显。

而在反义复合词中,有18个较为虚化的副词,其语义功能并不是在成词之前就已产生,而是一种后起义(董正存,2008;袁嘉,2009)。意义的转化往往引起词性的改变,这是句法语义交互匹配的结果。从统计来看,26.7%的动词在成词之后,语义转向了名词。而形容词向名词语义功能的转化则高达88.7%。名词成词之后其语义功能基本保持不变。

即使在同一语义范畴之内,也并非所有的反义词都能并列成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

单音动词“开”与“关”“闭”“合”都存在反义关系,但《现代汉语词典》只收录了“开关”这一个反义复合词。CCL语料库中与“开”“闭”搭配节点情况,如下表(付娜,2008):

表4 与“开”搭配的节点的分布

语义类	频度	比例	节 点	数量
门类	4479	85.04%	门、门户、门洞、大门、车门、后门、家门、边门、二门、门帘、柜门、厨门、国门、闸门、关门	15
窗类	240	4.56%	窗、窗户、窗子、窗口、天窗、百叶窗、窗帘	7
锁类	132	2.51%	锁、门栓、栓、栓子	4
房屋类	41	0.78%	仓、墓、舱、厕所、房间、教室、库	7
容器类	267	5.07%	箱、箱子、皮包、抽屉、柜子、保险柜、柜、壁橱、柜橱、棺、瓶、缸、罐、坛、桶、盒、包、袋、件、袋子的一头	20
盖子类	18	0.34%	盖、盖子	2
嘴类	7	0.13%	嘴、嘴唇	2
其他动物构件	47	0.89%	颅、肠、脑部	3
他类	36	0.68%	炉、笼、圈、幕、帷幕、闸、阀、龙头、坝、伞	10
总计	5267	100%		70

表5 “开”“闭”搭配节点的比例对比(付娜,2008)

	门	窗	房屋	锁	容器	盖子	嘴	其他动物构件	他类	眼
开	85.04%	4.56%	0.78%	2.51%	5.07%	0.34%	0.13%	0.89%		
闭	2.0%	0.44%					21.23%			75.04%

“开”和“闭”这一对反义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严整的对应。两词皆为单音词,典型搭配的语义类都是“门”类。但从上表可以看出,两词节点的重合率并不高,“开”的节点集中在“门”类,而“闭”集中在“眼”类。也就是说二者共有的搭配域比较小,反义对称性不高。因此,连用对举的情况比较少,不易成词。与“闭”具有反义关系的词“睁”,与“眼”共现的概率几乎是100%,之所以也没有成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闭”的原始搭配义为“闭门”,后来才与节点“眼”相搭配。

表6 “开”“合”搭配节点的比例对比(付娜,2008)

	门	窗	房屋	锁	容器	盖子	眼	嘴	手	翅膀	书册
开	85.04%	4.56%	0.78%	2.51%	5.07%	0.34%	0.13%				
合	2.81%	0.56%			2.13%	1.8%	34.9%	23.34%	5.5%	0.67%	22.0%

相对于“闭”而言,“合”与“开”搭配节点的重合率稍高一些,其共有搭配域的范围更大,因此反义对举或并列的可能性也越高。虽然“开合”没有被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当中,但是在某些固定组合中已出现且顺序凝固,如“开合自如”“信口开合”等,而且在CCL语料中,“开合”出现了251次。说明“开合”已出现了词汇化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开”与“关”,二者的反义对称性最高。语义搭配节点情况如下表(付娜,2008):

表7 “开”“关”搭配节点的比例对比

	门	窗	房屋	锁	容器	盖子	嘴	其他动物构件
开	85.04%	4.56%	0.78%	2.51%	5.07%	0.34%	0.13%	0.89%
关	86.99%	10.31%	0.06%		0.91%	0.5%		

虽然“开”“关”在语义上也存在不对称,但从上表来看,二者节点的重合率高达90.9%,共有语义域的范围最大。说明二者的反义对称性最高。不管从语义本身,还是搭配使用的角度来看,“开”与“关”都是一对典型的反义词。因此二者反义对举或并列成词的可能性最大。反义复合词“开关”的融合程度或者说词汇化的程度相对于“开合”而言,可接受性更高,且成词之后,随着词汇化的发展,词义又发生了整合,从动作领域转指到属性领域,出现了融合义。

从上述对比中,我们发现虽然“开”与“关”“闭”“合”都是同属某一语义范畴的反义词,但只有搭配节点的重合率越高,共有语义域越广的反义词,其成词的可能性才越大。

三、对反义并列结构成词的初步解释

(一) 语言的标记性和象似性

反义并列结构之所以能够成词,这跟汉语本身的属性有关。从标记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反义并列结构分为:有标记、无标记、有标记和无标记并存三类。但事实上,实际语言中只存在两类——“有/无标记共存”的语言和“有标记”的语言。根据反义并列结构的标记情况,我们又可将语言分为“强标记性语言”和“弱标记性语言”。以汉语为代表的语言属于“弱标记语言”,并列结构的无标记现象大量存在,反义对称性高的词经常不需要并列标记就可以直接组合。而其他语言如英语等没有形式上的反义并列复合词,如“大小”“长短”等在英语中的对应形式一般为一个独立的词“size”“length”等。反义并列结构的标记性只有一种可能,即有标记。如果没有并列标记,就会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即使极少数有反义并列复合词的语言中,其复合词也带有某种形式标记。如南岛语系的高山族语言,它的复合词的连接方式是:两个并列肢之间用连字符连接,连字符中间用“a”表示其中的语言距离(邓云华、储泽祥,2005)。

a a-tcalala-a-uqalai (兄弟)

兄弟姊妹幼 男人

韩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父母:어버이中的“이”是表人名词的标记。

以汉语为代表的语言则不同,并列结构缺省标记时,并列性的成立和意义的理解都不会受到影响,只是成分之间的语义距离不同于有标记的并列结构。所以,从标记性的意义上来说,汉语等语言属于“弱标记性语言”,其他语言则属于“强标记性语言”。

反义并列结构中标记性程度的强弱象似于并列肢之间的语义距离,即,并列肢之间语义距离越小,其形式标记越弱;反之,并列肢之间语义距离越大,其形式标记就越强,即标记性的强弱对应于语义距离的大小。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汉语反义并列结构在语义距离、形式距离与标记性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从左到右是相应程度大小的连续统:



图 1

汉语中,反义并列结构在词汇层面一定是无标记的,并列肢之间的语义距离最小;同类短语一般具有两种标记可能性——有标记或无标记,根据具体情况使用或不使用连接词,并列肢之间的语义距离大于复合词;而异类短语,各并列肢之间形式或意义上不同类,必须使用标记,并列肢之间的语义距离最大。而其他语言必须使用并列标记,且不能缺省。如英语 big *and* small, more *or* less; 韩国语中的连接词和日语中的と都不能省略。汉语反义并列结构的弱标记性、强象似性和连接词的低频使用性都有力地说明了汉语是一种意合性的语言。

作为“弱标记性语言”，汉语的象似性大于“强标记性”的语言。

（二）民族文化在词汇上的表征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曾经说过：“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帕默(L. R. 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由此，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角度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从不同语言的词汇形成及其特点上，我们又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文化风貌。那么，汉语中的反义复合词则是汉民族文化在词汇上的一种独特表征。它的产生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结语

反义并列结构之所以能够成词既有汉语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条件的推动和制约。就词类本身而言，名词、形容词受句法、语义的制约相对较小，成词的可能性较大，动词性反义并列结构受语义等的限制，其成词的可能性较小，或词汇化的程度较低。汉语标准音步的双音节性也制约了反义并列复合词一般为双音节，三音节或四音节的反义并列结构很难成词。从语言类型的角度来看，汉语反义并列结构的弱标记性、强象似性和连接词的低频使用性都有力地推动了反义并列由短语结构向词汇结构的发展。相对于其他词汇而言，反义复合词更加突显了汉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思维观念，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词汇类型，具有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 [1] 储泽祥. 2003. 异类词联合短语研究. 中国语文, (3).
- [2] 邓云华. 2005. 英汉联合短语的类型研究. 外语教学, (1).
- [3] 邓云华, 储泽祥. 2005. 英汉联合短语的共性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 [4] 丁喜霞. 2006. 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5] 董正存. 2008. 情态副词“反正”的用法及相关问题研究. 语文研究, (2).
- [6]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7] 冯胜利. 2009.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8] 黄月圆. 1995. 复合词研究. 国外语言学, (2).
- [9] 刘丹青. 2008. 并列结构的句法限制及其初步解释. // 中国语文杂志社. 中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张博. 1999.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 中国语文, (2).
- [11] 周荐. 2003. 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 中国语文, (2).
- [12] 朱德熙. 1982.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 朱永生, 严世清. 2000. 语法隐理论的理据和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 [14]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